

三書齋文存

【第一卷】

梁超然 著



雙溪有清音
流雲出翠嶺
駐足半山亭
芳緣登絕頂

广西人民出版社

三书斋文存

(第一卷)

古代文学研究(一)

梁超然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三书斋文存. 第一卷/梁超然著.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10.7

ISBN 978-7-219-07040-6

I. ①三… II. ①梁…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②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39146 号

责任编辑/廖集玲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邮政编码 530028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网 址 <http://www.gxp-ph.cn>

印 刷 南宁市开源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45.5

字 数 112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7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7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9-07040-6/C·232

全套定价:218.00 元(全四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作者简介

梁超然，男，汉族，1938年闰七月初一出生于香港，广西岑溪市人。1981年5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61年广西师范学院（今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教授。广西优秀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曾任广西民族学院中文系主任，广西古籍研究所所长。广西通志馆副馆长。广西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广西社会主义学院院长，广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民盟中央常委、民盟广西区委主任委员。2009年退休。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秘书长、常务理事，中国柳宗元研究会会长，广西语言文学学会、广西儒学会副会长、名誉会长，广西古籍丛书编委会顾问，香港诗词学会顾问。

1961年9月至1963年8月在广西师专工作，任助教；1963年9月至1993年7月在广西民族学院工作（其间因1965年底写文章反对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文革”中受批斗、迫害，1978年平反，晋升讲师。1982年晋升副教授，1985年晋升教授。1985年3月至1990年8月借调西北大学任硕士生导师。1983年3月任广西民族学院中文系副主任，1990年任主任兼广西古籍研究所所长）；1993年7月至1998年6月在广西通志馆任副馆长，1998年2

月当选广西政协八届副主席，2003年当选广西政协九届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第五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第六、七届中央委员，第八、九届中央常委；广西区八届人大常委会常委。

1958年开始发表作品，曾出版专著《八桂诗人论及其他》、《天若有情天亦老——李贺诗歌赏析》、《传统文化沉思录》、《文艺沉思录》、《三书斋漫笔》等，合作撰著《〈粤西诗载〉校注》、《唐才子传校笺》、《曹邴诗注》、《于湮诗注》、《文笔精华》、《〈粤西丛载〉校注》等多种，主编《唐诗与中国文化丛书》、《古典文学作品赏析丛书》。发表学术论文50多篇，杂文、文学评论、小说、散文共约60多篇。《八桂诗人论及其他》获广西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论文《略论儒家思想与唐代诗歌》获国家民委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唐才子传校笺》(合作)获国家古籍整理优秀成果二等奖，《传统文化沉思录》获广西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粤西丛载〉校注》(合作)获广西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论晚唐诗人曹邴》获广西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杂文《免称“老板”论》获“瞿秋白杂文散文奖”二等奖。1992年评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1992年评为广西优秀专家，1999年、2006年继续评为广西优秀专家。

此外，主编《老桂系纪实》、《陆荣廷与旧桂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新桂系纪实续编(1—6)》。发表《民主党派新一代代表人物的特点及其使命》、《推进国有企业改革，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等二十多篇统战理论和参政议政文章。《关于在广西建立可再生能源基地开发生物能源产业的提案》获全国政协优秀提案奖。

卷首絮语

《三书斋文存》四卷编校完毕，交出版社，工作告一段落应该搁笔了，但总觉得还应该对读者、朋友、同学交代几句。

如一些知我者所知，我是搞古代文学教学研究的，重点是唐代文学。从学生时代发表的一些论文如《中国古典文学中浪漫主义几个问题的探讨》，就表明了我今后的研究方向。但在古代文学教学研究之外，对于当今文坛还是很关注，见有一些应该发表点意见的文与事，就往往如朋友所说“破门而出”，破古代文学之门，写一些涉及当代文坛的评论、杂文，如关于《丑陋的中国人》、《河殤》以及较前的《海瑞罢官》之类。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写得比较多的是以《坛外杂话》为总题的杂文。现在“门内”的、“门外”的文章大都收在这里了。因书斋名为“三书斋”，所以就叫《三书斋文存》，叫“文存”其实是有点敝帚自珍的习气。

“三书斋”，乃读点书、教点书、写点书的意思。这是我一生追求的生活境界。有朋友问及：为什么是“点”呢？答曰：书如浩瀚无边的大海，似我等凡夫俗子一生能读到的、教到的、写到的只能是沧海之一粟耳，故曰“点”也。感谢程思远先生为我题写书斋名，今即用他的题字作书名题签，以为纪念。

古代文学门内的写了一些文章，用力最多的倒是《唐才子传笺证》晚唐四十多位诗人传的校笺。《唐才子传校笺》主编傅璇琮先生在《前言》中指出：“本书笺证部分的内容，大致包括：一、探索材料出处；二、纠正史实错误；三、补考原书未备的重要事迹。显然，按照这一要求，即无异于对唐五代诗人作全面的生平考证。可以想见，这是一件多么庞大的工程。”确实如此，特别是一些学术界接触得比较少的中、小诗人，研究起来就更有点筌路

蓝缕的味道了。承蒙傅先生的信任，把七八两卷除许浑等五传之外，其余四十多传都交由我负责。这个工作量是很大的，只能竭尽全力了。唐代诗人的资料浩如烟海，考证工作不易做，自己功力不深，只能差强人意了。本来想在此基础上作更深一步探讨，写一部《中晚唐诗人考论》，也做了一点，这就是收在第一卷中的《李远考略》、《鱼玄机考略》、《曹唐考略》、《温庭筠考略》、《李郢考略》等数篇，但由于工作变动，停了下来。不过这个计划还是想继续下去，如有所得，以后再呈献给读者。

想说一说的是那两篇历史小说。我学习古典文学之初，对以古代人物为传主的传记文学就很感兴趣。尤其是读了朱东润先生的《张居正大传》、《陆游传》以后，兴趣更浓。“文革”前就开始撰写《玉溪生传》。写了两章，“文革”初，手稿在抄家时被抄走了。“文革”中期想重起炉灶，条件不允许，没有实现，心甚快快。“文革”结束，政治平反之后，民族学院领导同意了我的建议，派一些老师到一些知名高校学习、取经。我就与另三位同事到了复旦大学。我很想去拜见朱东润先生，承蒙好友陈允吉先生（时任复旦中文系主任）为联系，并领我前往。朱先生一听说我是广西梧州人，十分高兴，原来朱先生从英国回来第一个工作岗位是梧州高中外语老师。他对允吉先生说，今晚破例，不用九点钟结束。于是我们谈了梧州小吃，猪油糯米糍，谭谦记云吞，猪红粥。然后朱先生谈了传记文学中的叙述与描写，谈了传记文学在史实基础上的虚构。我谈了对《陆游传》与《张居正大传》两传风格异同的认识。虽然朱先生说过今晚破例，但还是不好聊得太久，过了九点四十分，我们就告辞了。这一席谈对我启发鼓舞极大，回来后就把得到的启发付诸实践。这就是《漫漫封州路》和《南楼秋雨夕》这两篇历史小说，算是传记文学的试笔。但此后教学任务和其他任务比较重，没有把传记文学的写作继续下去，是很可惜的。

我喜欢杂文，当我还是一个没有选举权的少年干部时，就常到桂平新华书店看书，有点钱的时候也买点书。那时候喜欢看鲁迅的

杂文集，买过《二心集》、《三闲集》、《花边文学》、《而已集》等，有几本现在还在书堆里。到大学后，除了鲁迅杂文，还读秦似的《没羽集》、黄秋耘的《苔花集》和《聂绀弩杂文集》等等，阅读面更为广泛了。大学毕业后也偶尔写点杂文，记得早年曾发表过一篇《百无禁忌》，“文革”批斗时除反姚文元，这是重点被批判的，但至今找不到这篇文章了。我的杂文写作最多的时候，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文艺报》、《文艺理论与批评》、《中流》等刊物，以“坛外杂话”为总题，今都收入《文存》第四卷了。发表时用的是“迟樾”这个笔名。至于为什么这个时候写了这些杂文，除可参看第四卷附录郑伯农同志写的《序》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我喜欢杂文。

我有一方闲章“随遇而安”，是友人篆刻家冯宏顺先生的大作。冯先生是河南省政协副主席、民盟河南省主委，是冯玉祥先生的侄公子。我们常在一起开会、学习，相处甚欢，他表示愿赐我闲章两方，由我选内容，我高兴至极，即提请篆“随遇而安”和“子云”两方。“子云”是我的字。“随遇而安”是我的人生态度，我的人生道路如何，确实是只可遇不可强求的，既来之，则安之。对于学术，我也基本上是“随遇而安”，不强求，没有完整长远的规划，没有整体的学术设计，所以收获不多。抚摸着这一堆校稿，好像做了一次写作生涯的盘点，也可算是人生历程的一次盘点，收获很少，感触颇多。梧州龙母庙有位李大师，他算我将寿八十四岁，那么，我还有十二年。这次盘点算是第三季度盘点吧，到年终盘点时，但愿库存能增添一些。日后，主要想把《中晚唐诗人考论》再做一些，短篇的传记文学写一点，稍补些少遗憾耳。

2010年7月2日《文存》校读后于三书斋

总目录

第一卷

古代文学研究（一）

论文

第二卷

古代文学研究（二）

《唐才子传》晚唐诗人传笺证

晚唐散文选注

第三卷

古代文学研究（三）

中华传统文化的思考

八桂山水旅游诗话

天若有情天亦老

——李贺诗歌赏析

曹邺诗选注

于湮诗选注

第四卷

坛外杂文

随笔

评论

作品

目 录

古代文学研究 (一)

论 文

中国古典文学中浪漫主义几个问题的探讨	(001)
唐诗繁荣原因的几个问题	(026)
略论儒家思想与唐代诗歌	(035)
传统文化的儒、佛、道及其包容性	(046)
综论李白《蜀道难》的作意问题	(057)
城阙、宦游及其他	(070)
略论辛弃疾在词史上的地位	(075)
略说严羽诗歌理论之本质特征	(088)
严羽对元白的态度及其美学追求	(100)
略论袁崇焕的诗	(104)
关于王鹏运的词	(121)
略说《粤西诗载》的史学价值与美学价值	(127)
* * * *	
柳诗风格论略	(143)
略论柳柳州的激愤与忧伤	(158)
略论李贺诗歌的艺术风格	(169)
李贺潞州之行新考	(177)

晚唐诗人李远考略	(181)
温庭筠考略	(194)
温庭筠交游补考	(204)
鲁迅旧体诗与李商隐诗艺术特色之比较	(210)
李商隐考略二题	(226)
雍陶交游考略	(233)
杜牧绝句中的自然美	(243)
杜牧绝句四首浅说	(248)
为评价杜牧《早雁》进一解	(255)
曹唐考略	(259)
晚唐诗人曹唐和他的诗	(267)
论曹邴	(275)
刘驾的交游、行踪及其他	(290)
鱼玄机考略	(295)
李郢考略	(308)
论晚唐诗人于湮	(317)
于湮边塞诗的特色与晚唐边塞的衰微	(328)
唐末五代广西籍诗人考论	(338)



中国古典文学中浪漫主义 几个问题的探讨

周扬同志在全国第三次文代会上所作的《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的报告，正确地指出了我们文学史研究中的一种偏向：“忘记了在整个文学艺术历史的巨流中，不断积累起来、丰富起来的优良的浪漫主义传统。”^①不容否认，我们过去在文学史研究中是存在这个偏向的。

我们都知道，高尔基认为文学史上的两个基本潮流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我国的文学史也不例外，浪漫主义（指积极的浪漫主义，下同）以它的灿烂的色彩在文学史上与现实主义交相辉映，无比地丰富了文学遗产的宝库。作为文学史上的基本创作方法，浪漫主义有着它自身的传统和发展规律。我们在研究文学发展历史的时候，不应该忽视对这个优良传统的研究。特别是毛主席“根据文学艺术本身的发展规律，从当前革命斗争的需要出发”^②而提出了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的时候，我们研究文学史上的浪漫主义传统，加以继承发扬，推陈出新，就更有现实意义了。这篇文章想就古典文学中的浪漫主义提几个问题与大家共同探讨。

—

首先，我感到过去对于浪漫主义的某些不全面以致错误的看

法需要加以商榷，并在这里简单地涉及文学史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关系问题。

在研究我国古典文学当中，有一派意见认为浪漫主义只是现实主义的一种精神与特色，认为现实主义可以包括并代替浪漫主义。持这种看法最有代表性的是冯雪峰。他在《中国文学从古典现实主义到无产阶级现实主义发展的一个轮廓》一文中这样说：

积极的浪漫主义是和现实主义的精神相通的、互相渗透的，并且我们可以把它当作现实主义的精神与特色之一概括到现实主义之内^③。

在冯雪峰看来，文学史上的浪漫主义是根本不存在的，它只不过是现实主义的“精神”与“特色”之一而已！这种错误的看法，在比较广泛的范围内得以流传。在某些研究文学史的同志看来，在中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可以包括并代替浪漫主义，认为浪漫主义“基本上属于现实主义范畴”^④，认为在“考察文学史上现实主义的发展时，没有理由把积极的浪漫主义的作品排除在外”。^⑤

这些说法虽然不尽相同，但同样地是忘记了我国丰富瑰丽、争妍斗艳的文学长河里优秀的浪漫主义传统；忽视了浪漫主义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方法在我国文学史上存在着、发展着的事实观点。

持这种错误的观点的最普遍的理由是：因为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都是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真实地反映现实的，在这一点上它们是相通、甚至相同的，所以现实主义可以包括浪漫主义，或说浪漫主义属于现实主义范畴，是现实主义的精神特色之一。

诚然，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截然地相对立来看是不应该的。但是由此看不见它们之间的区别，把它们混同起来，让现实主义包括并代替浪漫主义，则是错误的。因为但凡在文学史上属于进

步的创作方法，都是反映现实的。然而各种不同的创作方法在反映现实的过程中，则有它自身的方法、特点与规律，它们之间谁也不能包括谁、代替谁。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也就是这样，从我国文学史上的许多事实中不难看到这点。李白与杜甫是差不多同时代的作家，他们一同经历过唐代的大变动时代——安史之乱的时代，也都在自己的创作中反映了那个时代。但是浪漫主义的大诗人李白在自己的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反映现实的艺术特征、规律，与现实主义大师杜甫的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却有着极为明显的差异。这里可以拣这两位大诗人的代表作品来看。李白在他的“古风十九”里就越过了现实，而“西上莲花山”升上美丽的太清仙境，描绘了一派飘忽渺茫的幻想境界，接着笔锋一转，点出了他的这种幻想，乃是出于对“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的现实的不满与愤恨而发的。这首诗虽然反映了现实，但它是用一种非常美妙的幻想境界来与现实加以对照，以激发人们对于现实的不满与反抗的。杜甫则不然，例如在他的名篇《三吏》中的《石壕吏》里，却是冷静地面对残酷的现实，深入现实，深刻地揭发了“有吏夜捉人”的令人愤慨的腐朽现实。它对现实的揭露是通过详尽的、具体细致的描绘来完成的。这些诗篇都同样地是反映了现实，但是反映的方法又是迥然不同的。所以周扬同志认为“现实主义者偏重观察，善于描绘客观世界的精确的图画；浪漫主义者偏重想象，善于抒发对理想世界的热烈幻想。两者从不同角度反映了现实，丰富了文学艺术的历史”。^⑥也是由于这样，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在艺术风格上更有着鲜明的特色。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就已经以“飘逸”与“沉郁”这两个相对立的概念来加以区别它们。他说：“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这种比拟虽然比较抽象，但却是很正确地说出了他们在艺术风格上的鲜明的对比。譬如李白的“西上莲花山，迢迢见明星，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霓裳曳广带，飘拂升天行”（古风十

九)所描绘的飘飘欲仙的形象,与杜甫的“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兵车行)所表现出来的对于现实的悲愤、沉郁的情绪是非常鲜明的对照。

仅从以上李白、杜甫的简略比较里,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我国文学史上两种创作方法——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区别了。

在我国古典文学中,不仅从文学创作上表现出这两种创作方法的区别,而且在为数丰巨的总结文学创作经验的文学理论著作里,对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区别也作出了一定的论述。

我国文学史上最早的文学理论著作,如刘勰的《文心雕龙》与钟嵘的《诗品》里,已经看到浪漫主义是与现实主义同时存在的独立创作方法。《文心雕龙》在《辨骚》与《铨赋》中分别论述了这两者的特征。它认为浪漫主义的《离骚》的特点是“气性铄古,辞采切今,惊彩绝艳”,而赋(指有现实主义价值的赋作)的特点在于“写物图貌,蔚似雕画”。这样,情感充实的《离骚》与侧重描绘形象逼真的赋作,就有着明显的区别了。钟嵘在《诗品》中论述到诗三义——兴、比、赋的时候,这样说:“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这段论述里除了兴是说文学的含蓄与美感作用,“因物喻志”与“直书其事,寓言写物”则又是看出了两种创作方法的区别,前者可以说是属于浪漫主义范畴,后者则是属于现实主义范畴的。

到了宋代,严羽在他的《沧浪诗话》中通过具体作家的论述看出了两种创作方法的区别。在谈到李白、杜甫的时候说:“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太白《梦游天姥吟留别》、《远别离》等,子美不能道;子美《北征》、《兵车行》、《垂老别》等,太白不能作。”就是通过李、杜来论述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不同;明谢榛在《四溟诗话》中也有以“景实”、“景虚”来说明;及至王国维则有“写境”、“造境”、“理想派”、“写实派”来区别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了(见《人间词话》)。这些都是古典文学

理论著作中，对这两种创作方法的区分的认识。这些论述自然还是不够清晰具体的，但都在不同程度上说明了浪漫主义是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方法与现实主义区别着而存在。

文学史研究中，另一种忘记浪漫主义优良传统的说法，是认为我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从来都是结合的。持这种观点的人一致认为，现实主义是反映现实的，但是不能没有理想；浪漫主义是反映理想的，但又以现实为其基础，因此认为“两者不结合几乎是不可能的”^⑦。

根据这种说法推论，在我国文学史上不仅浪漫主义不存在，而且现实主义也不曾成为一种独立的创作方法，其实质也取消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关于浪漫主义本身具有现实因素，如高尔基所指出，它是产生于“既定的现实中”的，上面已经谈过了。至于现实主义的理想因素问题，我以为茅盾同志在作协理事会三次（扩大）会议上的报告中分析得很对：这“看来好像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了，然而不然，这样的寄托希望于未来的结尾不过是象征的手法，它本身并不代表什么理想”（《反映社会主义跃进的时代，推动社会主义的跃进》，《人民文学》1960年8月号）。譬如《孔雀东南飞》的结尾就是这样，被很多同志举为相结合的例证的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结尾亦然。而且这种结尾还往往是作家对于现实黑暗的一种喟叹。这并不能标志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那末，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又应如何体现呢？根据高尔基的论述，它并非理想与现实这两种因素的某些表现，而是紧紧地“结合成为第三种东西”，“即能够用更鲜明的色彩”“用更崇高更适当的语调来谈论”时代的“第三种东西”^⑧。这样看来，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特征，在于它在反映现实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新的特色，亦即鲁迅先生所说的“不是作品后面添上去的口号和矫作的尾巴，而是那全部作品中的真实的生活，生龙活虎的战斗，跳动着的脉搏思想和热情等等”。

所以它是一种崭新的创作方法，它虽然包含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因素，但并非这两种创作方法的机械相加或某些因素的表现。它是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在新的历史时代里的新发展。所以我们不能认为现实主义作品里表现了一些“理想”或者浪漫主义反映了现实，就把它看作是相结合了。至于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在我国古典文学的形成问题，下面将涉及一下。

在这里，我们可以认为：在我国文学史上浪漫主义并非作为现实主义范畴内的一种精神与特色而存在，也并非从来都是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它是我国文学史上一种独立的艺术方法，在文学史上不断地发展着，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上有着不同的表现，有着自身的规律和特色，形成了具有极可宝贵的传统的艺术流派。因此，我们在研究我国文学发展的历史时，应该对“整个文学艺术历史的巨流中，不断积累起来、丰富起来的优良的浪漫主义传统”加以研究，加以批判继承。

二

毛主席告诉我们：“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⑨作为文学艺术的创作方法之一的浪漫主义也是这样，它也是时代的反映，是一定社会的产物。我们在研究它的产生、发展的时候，应该从它所赖以产生、发展的社会去寻求原因。过去我们一些文学史研究者，对于我国文学史上浪漫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的社会根源曾作过不少有益的论述，但也曾产生过不少误解。因之，我们在这里准备对我国古典文学中浪漫主义产生发展的社会根源作简略的探索。

曾有人根据西欧文学史上浪漫主义思潮产生的情况套用在我国文学史上，认为我国文学史上的浪漫主义产生自所谓“经济政治文化的上升”时期，他们认为：